

遏制尘肺病之害:法律法规落地是关键

□本报评论员 郑 莉

职业病 29972 例,其中近九成成为尘肺病。从行业分布看,职业病主要集中在粉尘高危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开采辅助活动行业。

尘肺病农民工维权难已被诟病多年。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加之尘肺病潜伏期较长,导致大批尘肺病人因无法自证其劳动关系或取证艰难而拿不到应得的赔偿。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申请过赔偿,即使是申请过赔偿的农民工中,也只有不足一成的人获得了赔偿。

打工收入抵不过看病支出,随之而来的是债台高筑、子女辍学……本希望外出打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却事与愿违。尘肺病农民工的境遇令人痛心!

更令人焦虑的是,调查显示,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低、自我防护意识差,近八成的人表示对高粉尘工作环境的危害不清楚或者完全不知道。

事实上,为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国家已设计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包括出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但完善法律和设计制度并未完全遏制尘肺病的蔓延。

要让劳动者免受职业病危害,首先必须让法规落地,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相关法律已经对用人单位、监管部门的责任和劳动者的权利做出详细规范。比如《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负责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等等。

在现实操作中,让法律条款真正落地,需要有关部门的监督更到位,需要用人单位充分承担起防治的主体责任,并为失责或侵权埋单。特别是针对尘肺病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也很难提供职业病鉴定所需材料的现实情况,有关部门应在对尘肺病的职业认定程序方面做出更加合理的安排,降低认定门槛,不能仅因缺少材料就将尘肺病患者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应加大对用人单位和外出务工人员的教育。尘肺病一旦患上,病程便不可逆转,医疗救助只是缓解患者一时痛苦,治本之策还在于加强预防。一方面要通过宣传,让涉尘企业充分了解尘肺病的危害,主动防御和降低粉尘危害。另一方面,要增强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醒劳动者主动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把把关,都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相关部门有效监管、严肃惩处违法行为,用人单位承担起应尽职责,农民工佩戴好防护用品,社会对尘肺病农民工家庭给予更多关爱,那么,尘肺病的蔓延就有望得到控制,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就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

女所在城市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有关部门应当在户口安置、医保结算、公共交通、进入公园等方面给予便利。”这些优惠待遇目的都是为了使老年人更好地居家养老,在感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避免“空巢老人”的一系列问题。

其三,推动个税合理。一直以来,个人所得税的“一刀切”备受诟病。同样收入的两个人,一个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另一个则是上有老下有小,二者的家庭赡养系数大相径庭,征收同样的个税显然不合理。对此,曾有专家多次提出,“个税改革在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的同时,应将纳税人家庭负担,如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情况计入抵扣因素,如此更能体现出税收公平。”此次深圳提出的“赡养费税前扣除”,对酝酿多年的个税改革无疑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张凯逸

12月8日,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民政局官网上征集意见。其中提出,“将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适度增加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女儿的工薪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实现赡养费用的税前扣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便有全国政协委员支招,在条件允许的地区,甚至可以给和父母同住的子女一点鼓励,比如减税。如今,这样

的设想在深圳率先有了回应,具有较大的导向意义。

其一,激励传统孝道。传统孝道在我国社会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必须弘扬孝道,发挥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前两天有媒体报道,南京一位七旬独居老人饿得啃棉被充饥,其虽有四个子女,但生意一忙就顾不上父亲了。“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孝不如无”,在运用法律惩戒不孝子女的同时,我们更应在政策上对孝顺老人的儿女予以鼓励,惩戒恶善,弘扬正气。

“不能让好人老是吃亏,这样社会才能有好的风气。”

其二,引领居家养老。虽然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业是大势所趋,但对大多数老人来说,还是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发达国家都鼓励子女与老人同住,以优惠政策支持子女扶养老人。有的国家规定,照顾老人的子女如果新建、改建住宅,使老人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也可以享受减税的优惠。而在我国,《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提出,“如果外埠老人到子

□韩祖超

荒唐的“有效期”

驾驶证、身份证都有有效期,为什么结婚证不能有有效期?近日,有人提出一种大胆而令人惊叹的建议:结婚证应设置7年有效期,到期自动离婚,这样一来,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好一个“不求天长地久,只为曾经拥有”,7年一换配偶的节奏,想必是针对夫妻共处的“7年之痒”而来,可这样的奇葩设想不仅会带来家庭亲缘关系的错乱,也会衍生一系列伦理问题。现实中,离婚往往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应给予理解却不应提倡,而一生一世的陪伴与相守才应是婚姻的主旋律。时下虽然提倡言论自由,但不意味着可以胡言乱语,哗众取宠。

悲凉的“雾霾假”

“终于停课了,可我的学生们却没有为放假感到欣喜若狂,反而感到悲伤,我和他们一样。”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一名中学教师撰写的《雾霾停课期间写给我学生的话》引爆了朋友圈,文中引导学生正视雾霾,不再消极抱怨。

为了配合雾霾红色预警,过去几天里,北京等地启动了机动车限行、学校停课放假等预案,可当“雾霾假”来临,国人却高兴不起来,其中不仅是因为少了出游的选择和乐趣,更源于内心对雾霾频繁来袭的无奈和担忧。在雾霾无法短期彻底消除的现实语境下,与其抱怨,不如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从我做起”的人多了,雾霾总会有所改善。

矫情的“找警察”

据《南京晨报》报道,近日,江苏南京秦淮公安分局接连遇到3起奇葩警情,有因泡面里没香菇要说法吵起来的,有为抢着买单打起来的,还有吃饭不肯为网友买单的。警方提醒,遇到小纠纷请尽量调解处理,实在无法处理可报警求助,珍惜警力从你做起。

“有困难找警察”当然没错,可像上述那些情况,如果大家都选择报警,有再多警察恐怕也不够用。社会秩序当然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尤其是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应该有更清楚明确的认识,有本事惹事、找事,也该有本事解决。在警力并不充裕的当下,一些人更应该懂得什么叫“自治”,而不是动辄“呼叫”公权力为自己鸡毛蒜皮的小事服务。

让农民工都能找到“娘家”

会。”新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的相关人员介绍,浦东新区早在2013年就开始推广“小三级”工会组织,60%以上的乡村镇街有完善的“小三级”工会组织。此次在农民工集中入会行动中再次提出,就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覆盖,吸纳农民工入会的同时,也参与、帮助企业成长。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要求,农民工集中入会的行动覆盖物流(快递)业、餐饮酒店、物业(保洁、保绿、保安等)、劳务公司、保安公司以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家政服务公司。

相较于前面几个行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家政服务总公司由于前期未被纳入建会范围,覆盖面相对薄弱。进一步接触之后,新区

总工会发现,聚集了大量农民工的行业由于其就业管理分散、劳动关系不明确等特点,调查排摸、建立起信息数据库就是一大挑战。

新区总工会积极争取政府对农民工入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借助农委、环保局、公安局、妇联等有关部门的力量,建立多层面的政府与工会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比如,他们通过农委掌握到还在正常运作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哪些;通过与妇联合作,了解家政服务行业的人员分布等。

专项经费保障服务到位

针对此次农民工入会行动,新区总工会建立农民工入会专项保障经费。据介绍,按照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全年会议协商计划,确定议题、时间、参加范围等,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每次会前,一般提前10天告知民主党派中央;有关部门一般提前5天提供文稿,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集中阅读,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作解读说明;民主党派中央集体研究准备意见建议。

会议协商中,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作有关情况说明,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发表意见建议,进行交流讨论。

(二)约谈协商的程序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提出的约谈,应将相关信息提前告知有关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可根据需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或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落实。

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约谈,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报中共中央,并协助中共中央办公厅落实。

(三)书面协商的程序

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沟通协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落实。民主党派中央的协商意见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总后报送中共中央。

民主党派中央或其负责同志的调研报告、建议等书面意见,可由其直接向中共中央

提出。

五、政党协商的保障机制

(一)知情明政机制。有关部门应适时向民主党派中央直接提供有关材料。中共中央统战部定期组织专题报告会和情况通报会,邀请有关部门介绍情况。

(二)考察调研机制。中共中央每年委托民主党派中央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实施。中共中央统战部每年召开选题介绍会,协助民主党派中央确定调研题目,协调有关部门参与调研,做好组织保障工作。支持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特色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地方党委和政府应予以积极配合。

(三)工作联系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开展的国内考察调研以及重要外事、人事活动,可根据需要,经统一安排邀请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加强同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系,视情邀请民主党派列席有关工作会议、参加专项调研和检查督导工作。

(四)协商反馈机制。需要办理的协商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交付有关部门,办理情况一般在3个月内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并抄送中共中央统战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反馈民主党派中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党委要结合实际,参照上述规定对开展政党协



□赵春青/图 林琳/文

又来了!

近年来,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电话困扰了很多——据《检察日报》报道,来自360安全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手机卫士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2.56亿个,从骚扰电话的类型上看,“响一声”电话以50.0%的比例位居首位,其次为广告推销、诈骗电话等。据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40余万起,造成群众经济损失107亿元以上。

不管工作还是休息日,不管你是在开车、开会还是在做其他什么重要的事,各种销售、骗子都会不时打来,忽悠你没商量。那些从境外打来的、通过技术手段修改来电号码的行为,运营商和相关部门当真无能为力吗?在“互联网+”的时代,不法分子或许已经跑在了前面,如果我们还用传统技术和方式去管理、应对,怎么可能打赢仗?更可怕的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赵春青/图 林琳/文

完善维权服务制度机制

(上接第1版)

二是落实“政策帮扶”,构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职工体系。工会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树立创新发展新理念,以精准帮扶困难职工为主体功能,全方位服务广大职工。

——努力为广大职工提供普惠性服务。大力开展跨区域劳务合作,共享就业信息,服务创新驱动战略,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展创业服务,积极扶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开办创业项目,推动工会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健康发展。以帮扶(服务)中心为依托,探索“互联网+”服务,主动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拓展服务功能。

——做实做细工会帮扶服务品牌。积极培育一批示范效应好、影响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品牌项目,深化送温暖等富有工会特色的服务品牌,做实全国工会创业就业援助月、技能培训促就业等活动,实现常抓常新,努力将帮扶工作与国家社会救助体系相衔接,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体系。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积极参与到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加强对农民工等特定人群特殊困难帮扶维权服务。工会维权要讲全面,也要讲重点,要积极推动解决农民工、困难职工、民族地区职工等特定人群特殊

要扫好自家门前雪,更要加强联防联控

(上接第1版)

为治理大气污染,河北在全国率先开展“拔烟筒”等专项行动,对612家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污染企业都安装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即便如此,污染防治仍面临严峻困境。

“有些企业白天看不到污染,晚上没有执法人员时,就会偷排。”杨崇勇并不避讳专项行动的“后遗症”。

在主动作为之外,“区域联防联控”已成为京津冀三地的共识,“加快京津冀三方之间应急机制的完善,要把空气质量监测点建得更多,一旦遇到雾霾严重的情况,三地要互通信息,赶快采取应急措施。”这是针对“下一步怎么做”,杨崇勇给出的建议。

据介绍,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已正式签

署《京津冀区域环保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10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近日,为应对重度雾霾,河北省环境执法监察总队会同北京市、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启动了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这是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的第一次联动执法。

尹海林也坦承,京津冀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力度,今后再有近期如此严重的雾霾天气,应该加强预警预报,三地联合统一行动。“一定要把该降的降下来。北京这次实行单双号限行,污染量下降了10%~30%,降幅不小。”

(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

体育不能有教授?

我在我思

邓亚萍获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消息甫一公布,便引起剧烈的社会反应。有关调查显示,七成网民对此持质疑态度,只有三成表示支持和理解。舆论对此似乎也是弹多赞少。有趣的是,最激烈的言论出自法大校内,该校一教授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这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

邓亚萍居然可以“污染”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我真怀疑,她是否有这样的“力量”。

事实上,根据法大党委宣传部门随后的回应,学校聘任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严格遵守了有关规定,邓亚萍也完全符合该校兼职教授的相应条件。而且,学校聘请邓亚萍是做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不是教学法,主要是指导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法大希望,通过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能为进一步提升学校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成绩,营造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氛围发挥积极作用”。

至此,事实已经了然:邓亚萍不是去当法学教授,而是去干乒乓球的老本行,以18个世界冠军、4个奥运冠军的身份,她出任这个体育兼职教授,应是绰绰有余。有这么大牌的世界冠军来推动该校的乒乓球运动和体育文化氛围,对学校当是美事一桩,何来“污染”之说?

不可否认,在巨大的质疑声浪中,有些可能是源于公众对邓亚萍前一段政绩的差评,有些是出于对高校滥聘兼职教授弊端的担忧,但也许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抱有这样一种心理:你一个打乒乓球的,怎配得上教授的头衔?再联想起前段时间某位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的言论:高考招收体育特长生是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体育特长生仅限于四肢发达”,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在进步,但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仍是“亘古不变”。这是中国体育之不幸,又何尝不是社会之悲哀!

曾几何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人们对运动员的认知;“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是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理解,“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这是人们对体育老师的调侃。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体育的认知在慢慢改变,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今日中国,体育依然没有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尤其是体育作为教育以及“塑造人”的功能,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掘。相应来说,体育作为文化、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也远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和发

一位在高校从事体育理论教学的老师,曾这样描述他被问及自己专业时,别人的疑惑:“体育还有研究生和博士生?”“你们读到博士,是不是比本科生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你们都研究些什么东西?”更有甚者,“体育还有教授?”“体育学院的课还有教材?”显然,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人对于体育的理解还停留在只是活动筋骨的身体层面。

我其实并不希望邓亚萍是替体育受过,而且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厘清,那些质疑邓亚萍聘法大兼职教授的声音,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对邓亚萍本人的反感,又有多少是源于对体育的误解。但我真心地期盼有那么一天,人们对于“体育教授”之类不再莫名其妙。

刘敬余